

第一章 導論

中國的「多元式民族主義」

穩定、開放、不好鬥；擁抱自由市場、多元政治、法治；與我們一同經營，建立牢靠穩固的國際秩序——一個以如此姿態嶄露頭角的中國，而非一個封閉內向、對抗的中國，才是美國人深遠利益所在。

——比爾·克林頓 (Bill Clinton, 1946-)¹

在一齣有趣的中國紀錄片《瘋狂英語》中，自學成才、行為相當富爭議性的中國英語「教師」李陽 (1969-)，將英語教學化為一場不拘一格的民族主義運動。² 李陽鼓勵學生用大喊大叫的方式「學習」英語，除為了增強駕馭外語的自信，據說也是使他們不再怕被標籤為「崇洋」，因為這套教學法反覆灌輸：要打倒美國，就先要完全明白他們；學習英語，為的就是戰勝美國。³ 這個「瘋狂」姿態一方面揭示了不少中國人對擁抱西方文化的熱切渴望，可說支持了以上前美國總統克林頓提過的「外望的中國」；但如此歇斯底里、很不「英語」的英語學習法，又似對應了克林頓口中受民族主義驅策、「內向」的中國。要明白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除了「威脅」和「友善」兩者，是否有另一套方法？雖然中國官方不談「中國民族主義」，只談「愛國主義」，以免與世界其他民族主義案例相提並論，但本章將解釋何以「愛國主義」不能簡單涵蓋上述行為，一個「多元式中國民族主義」框架卻可以。用甚麼名字呼喚它，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就像《瘋狂英語》一樣，難以用摩尼教非黑即白的思考方式去界定。一個不民主的中國，是否就如美國漢學家柯慶生 (Thomas J. Christensen) 所言，必然意味著

中國民族主義的升級擴張：「由於中共不再『共』，它必定更『中』」？⁴或如另一些學者如英國牛津大學的羅斯瑪麗·福特 (Rosemary Foot, 1948-) 相信，即使中國對當代世界秩序相當不信任，它仍然遵從那些「可以表現自己是負責任大國」的規範，⁵所以中國再強大，也不用擔心？到底這個「負責任大國」如何在民族主義的外衣底下成長，並成為崛起中的世界大國？

近年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話語引起了學界和社會不少兩極反應，就如近 20 年前，香港出生的美籍學者張霞 (1950-) 與現旅居新加坡的中國學者鄭永年 (1962-) 對「龍之回歸」觀點，已分別予以支持和反駁。⁶但這些年來，還是有不少重要發展值得注視，足以顛覆從前我們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認知。本書透過研究中美雙邊關係、中國社會持份者對中美關係的回應，及當代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三者之間的互動，嘗試在這兩極之間尋找其他研究空間，且從以下兩個觀點開始。

第一個論點是，我們熟悉的中國民族主義話語固然有其原有的生命力，但與此同時、某程度上，也不過是中國國內不同持份者 (stakeholders) 促進個人或群體利益的中介；他們或正或反地參與民族主義運動，也不過是在中國特殊國情表達意見的途徑。只要參與民族主義論述有助中國政府、知識份子或一般市民拓展任何形式的廣義利益，或鞏固他們在「民意」中的地位，這些參與者的目的已達，不一定要把民族主義話語付諸行動。基本上，很多民族主義話語都是疏導針對中國政府的規範手段，故表面的激昂其實有安全閥的作用。這些表面針鋒相對的參與者，說不定也有實質存在的內部分工，互相倚賴以受惠於民族主義論述。最後，無論主觀意願如何，種種因素引發的客觀效應可能是讓民族主義穩定中國，而非不少人直覺認為的動搖中國。

其次，本書假設有三個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同時發生：(1) 建構「中國價值觀」，作為樹立中國公民民族主義的實驗；(2) 一種冷戰後國際關係外交策略的發展，以賦予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力量和身份認同；(3) 針對所謂「反華陰謀」在日常生活表達，且與強烈的民族主義用詞並駕齊驅。雖然後者明顯屬過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前兩者卻相對能促進地區和平，兩者抵消後，中國民族主義可能又再違反一般人的直

覺，成為穩定外部政治的力量。

綜合兩個論點，這個複雜的中國當代民族主義運動——如本書結論所提出，一個非單一的、割裂的、多元的、由不同人物為不同目的而參與的運動——會在不斷被重塑和重構下，影響伸延到鄰近地區。只要中國政權維持目前的非西方民主式威權政體，但又不追隨極權的史太林式管治、不完全妨礙多元主義在民間發展，當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無論我們主觀是否喜歡，也很可能會擔當意想不到的角色，成為中國境內外的穩定劑。由於中美關係是中國對外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雙邊關係，也是整個中國戰略佈局的「重中之重」，本書即以1999年起的中美關係不同案例為研究對象，就上述論點進行詳細探討。

在將假設套用到本書涵蓋的四個案例前，此章作為導論，將先勾勒理論基礎與方法學等研究背景，審視為何現有的研究大多忽略民族主義的「穩定劑」角色，探討應如何看待這項氾濫。並列出選用的理論、案例、時間範圍與目標群組等。在中國研究的舞台上，對於「後天安門時期」的當代中國，特別在十多年前的西方學界，有不少常見的傾向簡化的假定。例如以往不少中美關係研究都曾設想，中國乃以一個單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面對世界，於是忽視了群眾的自發性，也不在乎和其他社會群組的馬基維利主義式權謀計算。反之，注意到中國多元一面的人，有時卻走向另一極端，相信政府和人民之間必然存在「零和」關係，常以勝負的角力研判事情發展。就中國民族主義而言，在中西學界，對其或有「天使化 Vs 妖魔化」的二元傾向，令其常被普通讀者誤解為一個目標綱領統一的單一進程；雖然有不少前輩學者曾把中國民族主義分類研究，卻鮮有直接將這些分類應用到外交政策，或結合不同群組的意欲。本書運用三個理論框架：「兩級非零和理論」、中國的「散離式公共社會」，及中國民族主義被割裂、拆析的多元本質，以構築新的理論框架。本書包羅措辭、價值、中國社會、民族主義、中美關係和國際關係理論而不逾，因有其單一研究綱領，只能視餘者為其他學術專注之議題，非本書探討之列。

1.1 檢視有關中美關係的學術研究

現有的中美關係研究汗牛充棟，常以意識形態之別（僅存最大的共產國家對自由世界領袖）、政治制度之別（「中國模式」對西敏寺式民主或籠統的西式民主）、社會價值之別（集體主義對個體主義）、文化之別（所謂東方對西方）等論調，去解釋中美雙邊關係的難點。但它們多有一個相對共通之處：假設了中國外交政策制定過程的主要特色，都是源自中央集權的黨國政府，相對忽略社會其他持份者的重要性；即令近年出現較多的中國民情研究，也鮮有專注他們在外交層面的功能。就中國政府如何制定對美政策，中西學者用過大量不同理論方法，其中以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等最為常見，餘者如國際組織理論、建構主義（見第七章）等也不乏，惟篇幅所限，在此不作全面介紹。

進攻性現實主義 (offensive realism)

自從旅美猶太學者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 1904–1980) 在 1947 年建立「現實主義」學派並將之概念化，再由冷戰世代的華爾志 (Kenneth Waltz, 1924–2013) 在 1979 年修定成「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整個現實主義學派就以國家的「利益最大化」(由摩根索提出)⁷ 及「安全最大化」(由華爾志提出)⁸ 為主調，一直是解讀中美關係最流行的路線。這個解讀方式有兩條支線，其中一條就是由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1947–) 奠基並熱烈宣揚的「進攻性現實主義」(或作「侵略性現實主義」)，信條一言以蔽之：「大國表現挑釁實非其所願，亦不代表它們內心有支配他國的慾望，而是因為要存活，就要不斷追求權力。」⁹ 強調對「存活」的追求，聽來何其熟悉，如已故美國史家霍夫施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 1916–1970) 數十年前揭示，20 世紀一些美國學者的信念其實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背景，看來這道統到了米爾斯海默這一代依然存在，令 21 世紀的進攻性現實主義思想，也在不知不覺間有了前者的影子。¹⁰

米爾斯海默自然把理論應用到中國身上，相信中美衝突將是「大國政治的悲劇」不能避免的部分，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在未來幾年大幅放緩，對美國大為有利」，因此如果美國「對自創建以來一直服侍周到的現實主義信條棄如敝履」，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在其經典著作的2014年新版特別加入「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的部分，以示其理論之與時俱進。¹¹ 事後孔明地分析之，不難明白為何中國官方喉舌如《人民日報》，或同一報社經營的暢銷國際關係小報《環球時報》，會稱之為「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因為假如美國外交奉進攻性現實主義為國策，圍堵中國、保衛霸權確是指導方針。¹² 這樣的政策自然備受別國抨擊：法國政治分析家韋爾奈特 (Daniel Vernet, 1945-) 稍加變奏，把美國標籤為「以在意識形態上 (而非實質上) 散佈『民主乃組織政治之最佳形式』概念為己任的『後現代帝國主義』國家」；¹³ 著有大量中國外交作品的中國資深外交人員周溢潢 (1930-) 亦曾引此「美國後現代帝國主義」為對世界和平 (更特別指明是對中國國家安全) 的威脅。¹⁴ 但另一方面，又有其他學者援引「中國對美謹奉進攻性現實主義」立論，相信中國也是奉行進攻性現實主義，例如美國人口研究所所長、聲稱其研究中國人口政策的博士論文因史丹福大學「向中國政府卑躬屈膝」而被駁回的毛思迪 (Steven Mosher, 1948-) 等人，就多次警告世人謂，北京的霸權行徑顯示中國乃一「現況挑戰者」，正在危害世界。¹⁵ 這些戰火連天的論述，都大致源自同一理論體系。即使較溫和的，也會主張「戰略平衡」，例如柯慶生建議小心處理美日同盟，以讓美國維持區內對華的戰略平衡。¹⁶

防禦性現實主義 (defensive realism)

以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學者葛拉瑟 (Charles L. Glaser) 等為代表的防禦性現實主義者雖亦出身現實主義學派，但就認為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國家傾向合作而非競爭。¹⁷ 此理論的一個變奏是展望理論 (prospect theory)，取自心理學，並由美國政治學教授列維 (Jack Levy) 在國際關係學界發揚光大。列維提出，處於「收益範圍」的國家，對不確定性的估量偏高，傾向避險；處於「虧損範圍」的國家傾向承擔不確定性，

下外交決定時敢於「尋找風險」。¹⁸ 這些論點自不完全相容——「不確定性」與「風險」屬不同概念，而將兩者混淆，正正是展望理論的一個漏洞：例如其中一位主要的展望理論家麥達莫 (Rose McDermott) 曾說：「拯救行動是最具風險的選擇，因為它代表著可能的後果中，最廣的變數。」¹⁹

無論如何，「相互合作的現實主義國家」的概念深深影響著一眾主要的中美關係學者。與被視為對中國不友好的「藍軍」相反，被視為對中國友好的「紅軍」領袖藍普頓 (David Lampton, 1946-) 就在其經典教材《同床異夢》指出，中美之間相爭與合作（「異夢」）雖會受世界體系的「同床」所限，但爭取對中國接觸合作相容，才是王道。²⁰ 以批評資本主義制度聞名的「世界體系理論」大師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亦曾建議美國採用防禦性現實主義政策，認為「軟性多邊主義」長遠對美國較有利，因它能避過與其他大國不必要的對抗。據華勒斯坦言，美國「需要從容親切地接受西歐及東亞的政治獨立性，視它們為政治伙伴，承認其有獨立組織架構的權利，只是美國（在軍事、貨幣等政策上）不容置喙」。²¹ 防禦性現實主義者大多呼籲美國與中國合作，以維持亞太區內的權力平衡，尤以軍備控制為重。對他們來說：「中國崛起仍處於初始階段，要建立安全框架或架構去擁抱中國，盡可能減少中美競爭，時間是有的……無論如何，對這些現實主義者來說，要宣告中國為敵人，實言之過早」。²² 另一位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羅斯 (Robert S. Ross, 1954-) 則認為，東亞地緣政治與中美的兩極性結合，對地區和平貢獻甚殷。²³ 關於兩種現實主義理論如何應用在中國外交，可參考台灣學者林一凡的文章。²⁴

這種意見傳入中國時，各家各派當然有不同反應。例如旅美新左派經濟學者李民騏 (1969-) 曾用傳統馬克思主義角度來大幅修訂華勒斯坦的理論（及支持華勒斯坦的中國自由派），認為中國崛起正代表資本主義衰亡，暗示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合作並非必須。²⁵ 然而，中國早在1989年後也有不少防禦性現實主義者出現，並為國家撰寫「綜合國力競爭」戰略，清楚申明目標，其中最強而有力之一，包括1992年面世、解放軍軍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黃碩風 (1935-) 的論述，其中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的以下目標，就是以防禦性現實主義為主軸：

1. 捍衛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政治制度；
2. 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安全；
3. 保衛和促進國家經濟、科技的持續發展；
4. 創造一種有利於本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國際環境；
5. 對來自國外的威脅、衝突和挑戰作出有效的反應；
6. 避免和遏制國內和國際間的戰爭；
7. 維護和提高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威望。²⁶

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充滿歧義的詞彙，常被作為左翼理論的批判對象，這裏只以國際關係理論梳理之。在國際關係框架內，新自由主義者同防禦性現實主義者一般，不相信現代國家之間需要直接對抗，而是認為國家之間的共同價值，最終會促使其合作、同化，而無展示武力之必要，但兩者依然有其他廣泛差異。著名加拿大時事評論員德魯里(Shadia Drury, 1950-)概括謂，以「歷史終結論」成名的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作為其中一位最典型的新自由主義者，曾將理念闡述如下：「自由主義將政治轉化為經濟，把貴族統治的世界安撫妥當、去政治化……社會不追求優越和支配，而追求平等。仍渴望支配世界的人，可以透過資本主義的財富追求找到出路。」²⁷當海峽兩岸的經濟學者在同樣場合大呼同樣口號，說「經濟就是一切，先於政治、社會，甚至統一問題」時，起碼在國際關係層面，就可以把他們的言論視為新自由主義話語。²⁸

將新自由主義應用到中美關係上，會得出兩個可能性。除了上述大師的理論，我們也可從一些年輕學者的論文看其應用，例如海外華人學者Cheng Sijin相信，中國內部改革已融入了全球體系，而在體系內與美國合作乃是前提，故中國無意挑戰美國在區內的利益，但就會逐步擔當「美國在區內實質初級伙伴」的角色。²⁹也有新自由主義者以此否定中國政權和平演化的必要性，就如香港的Lee Brenner認為，合作模式對中美經濟都有利，長遠更會使兩國在平等的基礎上磨合和互相依賴。³⁰

馬克思主義及國際主義

雖然今天已是21世紀，我們閱讀中美關係時，依然不應完全將那套或已過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國際主義觀拋諸腦後，因為中國新左派的部分理論基礎，正是源自這道統。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毛澤東(1893–1976)本人正是以其「三個世界」理論聞名，視中國對美抗爭(至少表面上)為「第三世界」無產階級對抗「第一世界」資產階級國家的鬥爭。³¹某程度上，他的理論似乎承襲了蘇聯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的教誨，而列寧主張所有共產主義者擁抱國際主義，超越國家地域與民族主義，以階級劃分世界。³²因此中國的國際主義胸懷常被老一輩學者浪漫化，就如冷戰時代的殿堂級美國漢學家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也認為，中國的國家利益附屬於共產集團或「第三世界」。³³於是，也有學者如哈佛大學的戈迪溫(Steven M. Goldstein)般，堅信當時的中國外交政策具有不少國際主義元素。最激進的一幅「具國際主義特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想圖則來自蔣介石(1887–1975)父子治下的台灣：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常批評中共不「中」，因為中共正計劃為共產主義而「滅亡中華民族」云云。³⁵

不過近年來，不同學者已多方嘗試發掘毛澤東時代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成份，以論證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的有限影響。如老早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美國政治學者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 1937–)所述，民族主義才是國際主義外交背後的主旋律，因為「毛澤東明顯不信這一套，並想像出一個由中國領導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認為這是對中國人最好的了。」³⁶史學家范乃思(Peter Van Ness)³⁷及以研究中非關係的經典《星雲寶舟》一書廣為人知的斯諾(Philip Snow)³⁸相繼提出，在毛澤東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部分對東南亞和非洲的外訪本質上都有民族主義色彩；台灣學界標誌人物余英時(1930–)則認為，中國近代的三次政權更易都源於中華民族主義。³⁹毛對「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嘗試，早於1938年中共六中全會已有表露；⁴⁰即使一些具爭議的消息來源，如毛澤東1954–1976年間的私人醫生李志綏(1919–1995)，亦在其回憶錄中表示，從其日常生活的閱讀習慣明顯可見，中國傳統教誨對毛澤東的影響，比之共產主義

遠為深遠。⁴¹ 無論如何，後毛澤東時代漸現的一個共識是，國際主義信條不論真確正統與否，在1978年起已被務實派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1904-1997)在著作中否定了：「我們現在還很窮，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方面，還不可能做得很多。」⁴² 從邏輯上看來，此句似為中國預留了餘地，在「富起來」時就可以重新推進毛式國際主義運動。但根據鄧小平理論，中國只有建立起「進步社會主義」(而非初級社會主義的小部分人「富」起來)才稱得上「富」，⁴³ 而實際上，這制度可能永遠都建立不起來。因此表面上，中國出現了一種本來就不十分恰當的、理應講求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論述和民族主義本質的混合體，作為當今政權的指導思想，但實際上，前者是煙幕，後者才是主體。至於今天的新左派學者能否傳承，我們將於不同案例慢慢體會。

1.2 第一理論框架：中國外交「零和遊戲」Vs「正和遊戲」

無論學者們應用甚麼理論講述中美關係，近年也越來越多學者質疑，以上眾多理論，是否真的可以簡單直接地應用在中國外交體系身上。中國新左派領袖王紹光(1954-)認為，將西方發展出的、多以中央集權為本的理論套諸中國，很多時毫無根據，(有時)對其祖國不甚公平，⁴⁴ 而無論我們是否認同新左派，以上觀察確實敏銳，因為這些理論對中國的定位，不少受中國共產黨(中共)作為列寧式、強調自上而下管治的政黨所影響，但這確有過分簡化之嫌。這種概念有一個方便之處，就是為單一決策機制提供了理論基礎，於是每當中國脫離舊有做法，中央集權主義通常理所當然地認為，外交政策遭到全盤修正，世界就以為中美關係仍然不確定，又或是後共產時期的中國善變得可以，令中國外交政策看上去似乎不可理喻。雖然近年上述假定已越來越少信眾，也有不少學者精明又審慎地區別中國外交決策的不同層次，⁴⁵ 但民間參與者如一般市民的角色就少有論及；就算把他們納入考慮，也只是作為那些在決策過程有決策權的領袖的陪襯。但國家政府與社會在外交層面的互動，應要比這種分析更為精密。